



星光丛书

西南联大

吴安宁 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教育出版社

西南联大

吴安宁 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南联大 / 吴安宁著. — 贵阳 : 贵州教育出版社,
2015. 8

(星光丛书)

ISBN 978—7—5456—0834—2

I. ①西… II. ①吴… III. ①西南联合大学—校史—
1937~1946 IV. ①G649.28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83720 号

西南联大

吴安宁 著

责任编辑 卓守忠 刘娟娟

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教育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观山湖区中天会展城会展东路 SOHO 公寓 A 座
(邮编 550081)

印 刷 贵阳标书王快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 张 6.5 印张

字 数 12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6—0834—2

定 价 1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厂址:贵阳市云岩区北京路 241 号 电话:0851—85853555 邮编:550002

目 录

第一章 跋山涉水

北平战火	/ 001
仓促迁移	/ 010
临时大学	/ 020
再起征程	/ 032

第二章 联大成立

徒步三千	/ 042
南湖边的诗情	/ 051
牛气的教授们	/ 062
蒙自的魅力	/ 071

第三章 艰苦岁月

铁皮屋下	/ 081
------	-------

学术和自由	/ 089
跑警报的日子	/ 097
炸弹下的书生	/ 107

第四章 联大精神

穷困交加	/ 117
大师之大	/ 128
娱乐和分歧	/ 138
民主堡垒	/ 149

第五章 各奔前程

变化之兆	/ 161
五四传统	/ 171
“一二·一”事件	/ 181
不负初心	/ 192

第一章 跋山涉水

北平战火

1937年7月7日深夜，在秀美的清华大学校园里，不少师生被西边隐约传来的阵阵枪炮声吵醒。当时正值暑假，留校的人员并不多，大家多以为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的部队在郊外演习，也就没太在意。

冀察政务委员会是一个特殊的行政机构，当时它直属于南京政府行政院，负责处理河北省、察哈尔省、北平市、天津市一切政务，在人事、财政、税务等诸方面均有一定的独立性，犹如一个半独立的王国。这个所谓的委员会成立于1935年，当时是因为日本在侵占我东北三省后，又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孱弱的中华民国政府不敢与之相抗，只得将河北和察哈尔省作为缓冲区，成立了这么一个机构。根据中日双方的协定，国民政府撤出了在冀察政务委员会所辖范围内的全部中央军和国民党党部，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司令宋哲元为委员长。宋哲元和他的二十九军是冯玉祥西北军旧部，晋察地区基本由西北军驻防。此外，

宋哲元还兼任河北省政府主席，二十九军副司令秦德纯兼任北平市长，天津市长萧振瀛、察哈尔省府主席张自忠也是二十九军的核心力量。当年冯玉祥率领着号称三十万的西北军与蒋介石争霸，输得凄惨，西北军经过南京政府的缩减，只剩下二十九不到 10 万人了，且武器装备落后，师、团、营分散驻扎在辽阔的华北平原上，短时间内很难集中形成有效力量。

其实，这天晚上吵醒师生们的枪炮声，并不是宋哲元部队的演习，而是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卢沟桥事变，也就是“七七事变”。

关于卢沟桥事变的经过，根据现存的《何（应钦）上将军事报告》一文，以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记录的秦德纯的证词，大致经过如下：1937 年 7 月 7 日半夜，大约在 23 点左右，驻扎在北平丰台地区的日本军队在未通知中国北平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在二十九军驻地附近进行夜间军事演习。之后日方以“一名士兵失踪”为理由，要求进入宛平城内搜查。当时驻扎在卢沟桥的是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二一九团吉星文部队的一营，营长金振中。由于时间已是深夜，中国驻军拒绝了日军的要求，日军随后包围了卢沟桥。经过协商，双方都同意天亮后派出代表去现场调查，但是日本的寺平副官依然坚持要入城搜索。在中方回绝这一要求后，日军开始从东西两门外炮击城内，城内守军未予反击。在日军强化攻击后，中

方守军以正当防卫为目的开始反击，双方互有伤亡。

虽然说卢沟桥事变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非常重大的事件，可当晚的枪声并没有引起北平市民太大的关注。自从清末《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日本人的军队就开进了北平城周围。老北平人对偶尔响起的枪声，已是见怪不怪了。

此时，北平、天津两地各大高校正值暑期，留校的师生并不多。国立北京大学年轻的物理学教授吴大猷也听到了枪声，但他并没有改变翌日与朋友们去西山郊游的计划，他约好了饶毓泰、郑华炽、樊际昌三位同去。饶毓泰，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郑华炽，比吴大猷高一届，现在同处一系共事；樊际昌，北京大学教务长。

同在7月8日，已有警觉的五六位教授去了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的家中，大家聚在一起分析形势。早年因新文化运动而名震全国的大学者胡适说，这起事件只是一次孤立的行动，并不会带来什么影响。正当他们交谈时，中国旅行社打来电话，报告津浦铁路已照常运行。听到这个消息，一群人紧张的情绪才得以舒缓，以为昨晚的枪声不过是小小的误会。

北大在北平城内，如果城外发生了冲突，还可能有缓冲的时间。而清华的校舍都在城外，就算是中日军队出现小规模摩擦，可炮弹不长眼，没准就会给学校造成极大的损失。故而清华大学的师生并不像北大的人那么淡定，开始着手把部分图书和仪器运到南方，妥善保管。7月8日，清华大学的

教授和学生们更加忙碌，急着抢运学校的资产。

“七七事变”发生后，身在庐山的蒋介石除了接二连三向华北方面宋哲元、秦德纯等人拍发“固守勿退”的电令外，还分别要求各界人士火速前往庐山，共商大计。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以及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等一大批学界名流均在受邀之列。

庐山上的会议没日没夜地紧张召开着，远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也发出全国通电，强烈主张抗日。可在冀察政务委员会这边，委员长宋哲元的态度却不明朗，并没有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二十九军是冯玉祥一手带出来的，并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而且这支部队曾与中央军爆发过数次冲突，最近的一次就是1930年的中原大战，倘若不是张学良率领东北军入关协助蒋介石，冯玉祥还不一定会失败。宋哲元本人俨然一方诸侯，从来就不大听蒋介石的调遣。如果对日战争扩大，西北军肯定首当其冲，宋哲元好不容易才有了这么一块地盘，故而并不愿意将部队就此消耗，一开始，他就打算与日本人“和解”。

尽管宋哲元、秦德纯等人极力跟日方沟通，意欲将“冲突”化解到最低限度，可对方本就是蓄谋已久，岂能善罢甘休？

7月10日，战争再次打响，大批日本援军从天津朝北平涌来。中方军队在上级摇摆不定的态度中屡失先机，损失惨

重。就在这一天，北大、清华两校的工作人员还忙着招生事宜，两校联合招生的 12000 份试卷，于当日在北大红楼的地下室里印了出来。北大研究生院的招生试题，也将在两天之后印出来。大家紧张地忙碌着，期望危机尽快过去，能够按时开学。

日本人可没想就此止步。7 月 14 日，好战成性的日本华北方面军新任司令香月清司宣称他的部队将“严惩暴乱的中国人”。

中方步步退让，日军咄咄逼人，华北局势阴云密布。

7 月 16 日，面对华北当权者宋哲元战和不定的暧昧态度，北平高校的查良钊、罗隆基、潘光旦、郑天挺、金岳霖以及中国营造学社的梁思成等文化界人士，致电国民政府最高统帅蒋介石，吁请政府坚决抗日。在庐山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的校长以及各界知识分子，也恳请中央政府尽快做出决断。

7 月 17 日上午，一身戎装的蒋介石面对 100 多名各党派代表、各界名流正式发表《抗战宣言》，郑重宣布：“……我们已快要临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极人世悲惨之境地，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如果放弃尺寸土地和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尽管中央政府已经决心抗战，但宋哲元等人依旧幻想着与日本人谈判，而分散驻扎的二十九军各部根本抵抗不住日本的疯狂进攻，在7月的后半个月里，每天都有坏消息传到北平城：

25日，日军在天津塘沽港卸下大批军用品，用40辆车日夜不停向丰台地区运送。此时，华北日军共集结了十万多人，厉兵秣马；26日，河北重镇廊坊沦陷，中国守军退到通州；27日，发现和平无望的宋哲元急令二十九军各部集结平津一带，日军参谋总长下达武力占领平津的命令……

战火蔓延，暑假留在清华大学的学生们不时看见日本飞机从顶上飞过，传闻有一枚炮弹落在南院的空地上，还好没有人受伤。听说宿舍不如科学馆坚固，学生们便倾巢而出，纷纷涌入科学馆的地下室，挤得水泄不通。

7月28日，日军向北平地区第二十九军发动总攻，南苑、清河、沙河先后陷落。下午，宋哲元委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长兼北平市市长，自己于当晚离北平赴保定，并令二十九军各部且战且退，往保定集结。

7月29日，日军踏入北平城，北平沦陷。

就在北平沦陷的当天下午，一部日军窜入北平西北郊的清华大学，将大批还没来得及抢运出去的珍贵图书、仪器设备用卡车装运出校园。校长梅贻琦在南京未归，代理校务的叶企孙决定尽快组织师生撤退，同时决定五人留守，保护校

园与校产。

时为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冯友兰回忆说：“我们参加校务会议的这几个人，还住在清华，说的是要保护学校。我在图书馆内对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说，中国一定会回来，要是等中国回来，这些书都散失了，那就不好，只要我人在清华一天，我们就要保护一天。有一次，夜里我和吴有训在学校里走，一轮皓月当空，四周一点声音都没有，吴有训说：‘可怕，可怕，静得怕人！’”后来日本军队正式进入北京城，开始到处接管搜查。冯友兰等几个留守教授觉得继续在清华园保管，已经没有意义了，无非是等日本人前来接收。于是大家决定南迁，“南迁的人和留守的人，都痛哭而别”。

北平沦陷的同日，驻防天津的二十九军一部守军也抵挡不住日本军队的进攻，于29日下午退往保定。

侵占天津的日军更加野蛮，召开记者招待会，扬言要摧毁南开大学。著名记者爱泼斯坦参加了那场招待会。他记载，某日军上尉道：“南开学生抗日拥共，老是给我们制造麻烦。”“南开大学是一个抗日基地。凡是抗日基地，我们就要一律摧毁。”

南开大学先是遭到海光寺日军兵营的炮火袭击。弹如雨下，南开教学楼、宿舍以及几十万册宝贵图书均被毁。大炮疯狂地轰炸了一通，日本的飞机又携带着炸弹奔来。校园内

残存的建筑以及相邻的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也受到严重破坏。第二天，日军又“派骑兵百余名，汽车数辆，满载煤油，到处放火”。几番践踏之后，南开被破坏得几乎成了一片废墟。南开大学一口重达一万八千斤、镌刻着《金刚经》全文的大钟，堪称国宝，也被野蛮的日军拉走，熔为做枪炮子弹的材料。

当时已经转往南京的校长张伯苓闻此凶讯，当场昏厥。下午，张伯苓强忍病痛，对《中央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奋励。”

清华与南开先后遭到日本人的侵扰与破坏，坐落在北平城中心地带、建校历史最为悠久的北京大学，也未能幸免。

因为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等均赴庐山参加政治会议，北大日常的工作都落到了秘书长兼历史系教授郑天挺身上。

进入北平城的日本人也许意识到北大在中国文化人心中的地位，为了笼络人心，他们到处拉拢气短的教授，计划开办“伪北大”，企图阻止北大南迁。面对危局，郑天挺顾不得妻子新丧，子女年幼且在病中，为保护学校及师生们的安全而日夜操劳。他回忆说：“北平在日军的包围上，情况十分危急。而北大留下的学生都是经济上极困难的。经人建议，在校中学生款内每人发给 20 元，以使之离校。所以到 7 月 29

日北平沦陷时，北大校内已无学生。但是蒋梦麟校长等离北平后久无来信，对学校下步如何处理，大家都不清楚，只能临时应付。日寇进城，形势更加恶化。当时教职工到校者寥寥可数，多数同仁都想早离危城，但又无路费。当时我仍每天到校办公，解决职工教授的生活和安全以及校产保护等问题。未走的教授如孟森、汤用彤、罗常培、邱椿、毛子水、陈雪屏等也多次开会，建议给低薪职工每人发30元维持费。并表示全力协助我共同支撑、维持学校局面。当时大家也常为我的安全忧虑。”

郑天挺一边想方设法安排北大教授和家属们离校南下，一方面呕心沥血保护北大校产。

8月25日，日本宪兵搜查北大办公室，发现了抗日宣传品。他们问是谁的办公室。郑天挺说是自己的。日本人有几分不信，因为当时各处的负责人早已逃散一空。此后，日伪人员经常到北大纠缠，汉奸“地方维持会”也出面约北平各校负责人开会，郑天挺并没去。

9月3日，大批日军进驻北大，在北大的许多办公室都挂上了日文本牌。即便如此，郑天挺依然坚持每天到学校，有时候甚至孤零零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直到10月18日，地方维持会将《保管北大》的布告挂在北大二院门口。郑天挺心知继续留在北大已经失去了意义，为了避免自己被日本人和汉奸缠上，他在北大门口与一些坚守的同事合影一张，然

后忍痛告别。

仓促迁移

卢沟桥战火已经燃烧，国民政府决心抗战到底。战争一旦大规模打响，在平津地区的大批教育、文化界精英就处在了危险的境地。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等联合发表声明，提出“教育为民族复兴之本”的口号，要求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将平津地区的高校迁往内地。国民政府此刻实在顾不上平津地区的教育文化名流们，因为更大的危机出现了——上海的淞沪会战打响。

8月13日，驻上海的日军大尉大山勇夫潜入虹口机场侦查，被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第九集团军某部开枪打死，日军趁势进攻，中方奋起抵抗，举世瞩目的“八·一三”淞沪会战就此拉开了序幕。

上海战火一开，国民政府也迅速采取了应对措施。翌日的国防军事委员会上，冯玉祥将军便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负责上海作战；同时委员会电令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对日发起总攻，中国空军也到上海协同作战。日本方面，15日就组建了以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的上海派遣军，两个

师团紧急乘船赶往上海。

8月17日，国防参议会最高会议在南京召开，蔡元培、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胡适、傅斯年等文化界名流也参加了会议。蔡元培等人极力主张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以及平津沪等重点大学迁往内地暂避，此请求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军队统帅部考虑再三，觉得必须在上海打一仗：

其一，上海离南京很近，若上海不保，南京很可能失去。南京是中华民国的首都，又是国父孙中山的陵墓所在地，不容日本人覬觐；其二，华北平原一望无际，日军的机动部队容易发挥威力，而江浙一带水网密布，倘若将日军主力吸引到此，反而能将其拖住；其三，在上海作战比在遥远的北方大平原作战补给方便，且上海是国际大都市，有外国租界，在这里开战极有可能引起大国势力的干涉，如果打得好，可能在外国调停下获得暂时的和平。

为了得到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蒋介石还委派胡适出使美国、孙科出使苏联，蒋百里出使德国，利用这些人在各国文化和政治界的影响力，争取援助。

不能不说国民政府的战略布局是有道理的，主动将大批日军吸引到上海来，借着江河水网的地势缠住对方；倘若日军主力大批登陆天津，再利用机械化行军，从华北平原直奔

郑州、武汉，抢占交通枢纽，堵住中国军队的退路，那么南京政府和驻防在江浙的大部分军队还真插翅难飞了。远在陕北窑洞的毛泽东得知日军增兵上海后，曾微笑着对人说：“日本没有大战略家，他们不可能战胜中国！”此后战局的发展，正如其所料！

上海战事一开，中日双方不断投入军队，中国守军先后投入 78 个师、7 个独立旅、3 个暂编旅、3 支海军舰队等，兵力总数在 70 万人以上。日军动用了陆军精锐和海军陆战队 5 个师团 1 个旅团达 28 万人，携航空母舰 4 艘、大型军舰 34 艘、飞机 400 余架和战车 400 余辆。因为武器装备对比悬殊，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对抗，尽管损耗极大却不退一步，与敌人对峙一个月，仍呈胶着状态。

蒋介石给北京大学文科学院院长胡适的任务是出使美国，可国难当头，胡适不愿意在此时离开，他表示“战争很急，我不会离开南京，与南京共存亡”。蒋介石亲自出面也无效，只得委托毕业于北大、如今在南京中央研究院任职的傅斯年单独劝说。傅斯年在焦急中眼泪都流出来了：“我要是有先生的名望和地位，我就去了，为了抗日……”胡适深为感动，终于答应。

9 月 8 日，胡适以学者的身份离开了战云密布的南京，由武汉转赴欧美。临行前，他还对蒋梦麟、傅斯年等人交代：“北大的事情，就有劳诸位了，等战争结束，我还回来教书。”